

钻仰集

汤一介先生研究文集

汤一介研究会《汤一介先生研究文集》编委会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钻仰集

汤一介先生研究文集

汤一介研究会《汤一介先生研究文集》编委会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钻仰集：汤一介先生研究文集 / 汤一介研究会《汤一介先生研究文集》编委会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9

ISBN 978-7-301-28740-8

I. ①钻… II. ①汤… III. ①汤一介 (1927—2014) —人物研究—文集 IV. ①K82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8265 号

- | | |
|---------|---|
| 书 名 | 钻仰集——汤一介先生研究文集
ZUANYANGJI: TANG YIJIE XIANSHENG YANJIU WENJI |
| 著作责任者 | 汤一介研究会《汤一介先生研究文集》编委会 编 |
| 责任编辑 | 吴远琴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8740-8 |
| 出版发行地 址 |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dianjiwenhua@163.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6694 |
| 印 刷 者 |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定 价 |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32.25 印张 392 千字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96.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目 录

序	乐黛云 001
---------	---------

总 论

新哲学的瞩望

——重温汤先生的教导	金春峰 003
汤一介先生及其学术贡献	郭齐勇 030
汤一介先生的哲学馈赠	
——让东西方哲学的不对称成为过去	安乐哲 041
汤一介先生的学术与时代精神	景海峰 062
诠释与体系：汤一介先生的哲学追求	杨立华 079

分 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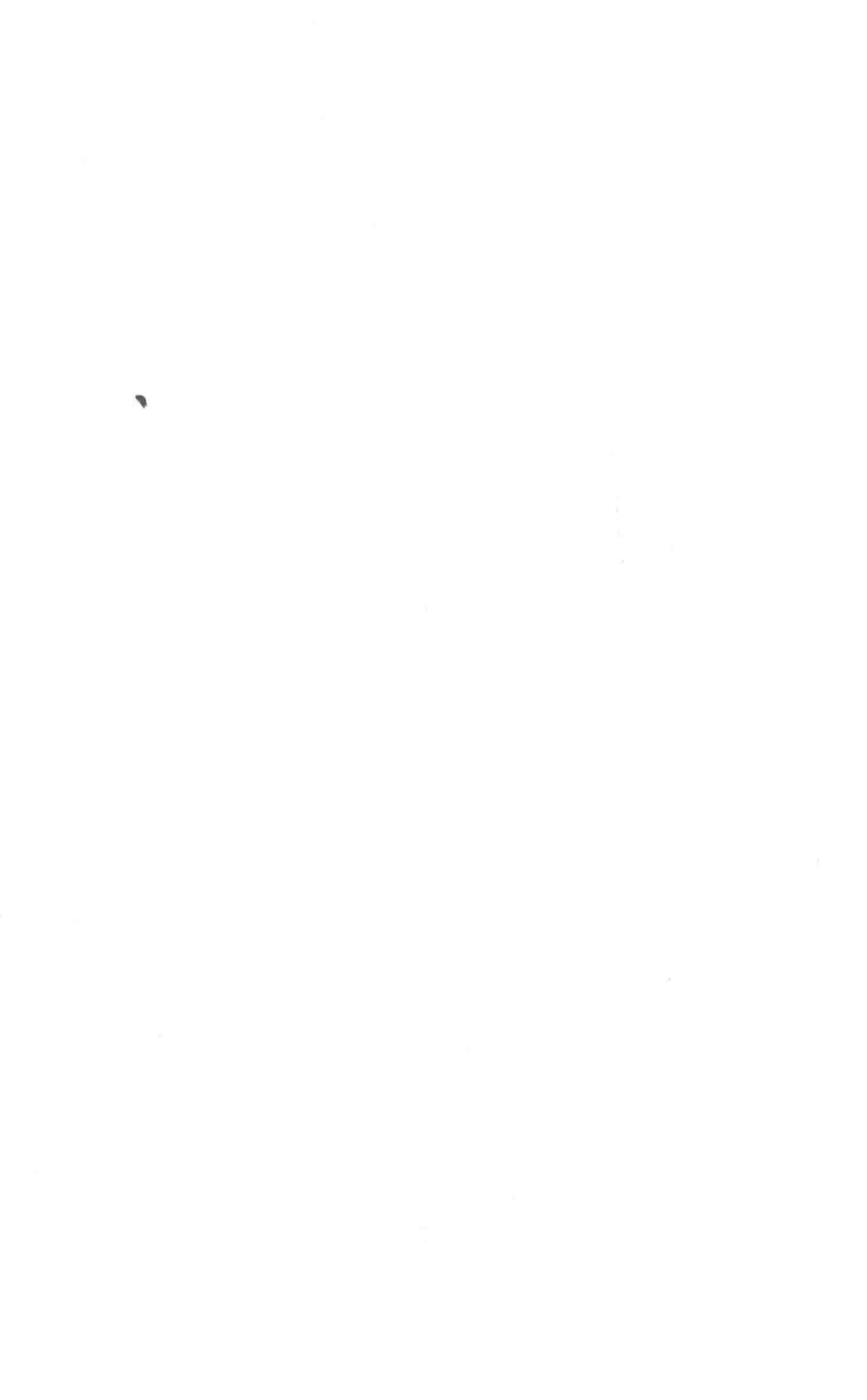
哲学与历史的融合：本体诠释学的本体诠释与中国解释学的	
历史诠释	成中英 095
聚焦中国诠释学问题	洪汉鼎 111
读汤一介先生《〈中国儒学史〉总序》的几点体会	牟钟鉴 145
汤一介哲学思想与易学诠释申述	刘大钧 155

汤一介与“中国诠释学”	
——关于建构“中国诠释学”之我见	潘德荣 168
汤一介先生概念范畴进路的方法论反思	杜保瑞 185
汤一介先生早年的魏晋玄学研究述略	黎业明 206
“汤氏哲学”中“比较哲学”再探	
——兼论汤师不讲“世界哲学”之缘由	张耀南 225
略论汤一介对文化问题的思考	孙尚扬 249
汤一介的宗教观刍议	孙尚扬 266
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	
——汤一介“普遍和谐”观的重要面向	陈 鹏 284
汤一介先生“礼法合治”的思想和儒学的教育教化	许 多 297
汤一介先生的家风和家学传承	赵建永 320
返本开新	
——汤一介先生《论道教的产生和它的特点》述评	张雪松 333
汤一介先生的三教关系研究	杨 浩 353

其 他

“形而上”与“物而上”两个概念，	
两种世界观	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 377
中西哲学的关系及其原因	张祥龙 384
天道视域下的魏晋玄学	张学智 403
儒学：本然形态，历史分化与未来走向	
——以“仁”与“礼”为视域	杨国荣 431
心性论的主要问题与逻辑关系	强 昱 450
乡村建设和现代政治习惯的建立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探究	干春松 491

总 论



新哲学的瞩望

——重温汤先生的教导

金春峰

汤一介先生是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学术史家、学术与文化的社会活动家，也是政论家、散文家。贯穿在所有这些“家”中的灵魂，就是他“自由即创造力”这句名言。汤先生《文集》之能成为中国多元文化中独特而绚丽的一元，即是“自由即创造力”的生动见证。先生《文集》还贯穿一种期望，期望有新千年的新哲学或与我国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相适应的新哲学的产生。他的“自由即创造力”的呼号也为这一新哲学提供了思想基础与精神动力。

一、“自由即创造力”

“自由即创造力”这句名言，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一种呼号，它贯穿汤先生活动的一生。1994年，先生发表《“现代”与“后现代”》一文，很赞同严复在《原强》中指谓西方社会的话：“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认为这抓住了现代社会的本质。先生指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不仅仅现代西方社会是如此，现代东方社会也应如此，一切现代社会都应如此。这是因为，‘自由’是一种现代的精神，‘民主’是保证人们实现‘自由’的制度。现代社会之不同于古代社会（或中古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可以较好地调动人们的创

造力。‘自由’的本质即创造力，它是现时代的时代精神。”先生说：“我们可以看到，两三个世纪以来，无论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是日新月异的。生产力高度发展了。这些只能在人们充分获得自由的条件下才能取得，都是人作为自由的人的觉醒的表现。因此，我们可以说，创造力来自‘自由’。至于‘民主’，它是一种制度，它可以是共和的、君主立宪的、人民代表大会的，等等，但它的功用应是保证人民‘自由’得以实现的。”^①1995年，先生发表《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一文，又重申了这一观点，指出：“‘自由’是现代精神，‘民主’是保证人们实现‘自由’的根本制度。”“自由的本质即创造力。”近代“个性的充分发展，自身价值和权利的获得，都是人作为自由的人觉醒了的表现。它是现时代的时代精神。”^②从国家制度与现代精神的高度，对“自由即创造力”发出响亮的呼号。这在九十年代是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

上世纪末，先生出席在哈佛大学举办的“高校人文教育当前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会议，发表题为《学术自由与中国高等教育》的讲演，指出：“北京大学最重要的特点应该是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中国大陆高等教育能否办好的关键问题之一就在于能否真正实现学术自由。”强调：“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有所改革，但三十年来‘左’的教条主义的影响仍然起着很大作用。北京大学如果要实现它提出的‘把北大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必须在‘学术自由’的条件下办极有特色的大学才有可能。”^③这把焦点集中到“北大”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

① 汤一介：《面对中西文化》，《汤一介集》第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2页。

② 汤一介：《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汤一介集》第9卷，第191页。

③ 汤一介：《学术自由与中国高等教育》，《汤一介集》第8卷，第233—235页。

源地。因为“北大”在全国学界、思想界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北大享有“自由”，实关乎中国整个学界和思想界的前景。

2007年，樊克宁采访先生。先生总结自己“文化大革命”的经历，说：“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不能都听别人的，得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自由的思想最重要。”^①这也代表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体验和心声。2008年，马国川访问先生。马国川问：“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您在想什么？”先生说：“大概就是想，我们得做点什么事情，因为感觉到1949年以后在哲学研究上问题比较多。我们学习苏联的那一套东西，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了，不利于我们中国的健康发展。70年代末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解放思想，那我们应该做什么？我的一个学生金春峰提出要重新评价唯心主义，因为唯心主义在苏联是被全盘否定的，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反动的，是为反动阶级服务的。好像是在《光明日报》上，大概是1979年或者1980年发表的。那时候我就有一个考虑：怎样才能使哲学研究特别是哲学史的研究突破原来的教条主义的框框？原来的说法是，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前者是进步的，后者是反动的。我就想，能不能把哲学史看成人的认识的发展史？既然是人的认识史的发展，不仅唯物主义会提高人的认识能力，唯心主义也可以提高人的认识能力。比如从西方哲学讲，当时都认为黑格尔是唯心主义，可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被马克思继承了。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权威杂志《中国社会科学》上，文章认为，从范畴的发展史来看，有的范畴是唯物主义提出的，有的范畴是唯心主义提出来的，常常是唯心主义提出的范畴在哲学史上影响更大。这样从人的认识

^① 《汤一介：自由的思想最重要》（樊克宁访问），《汤一介集》第10卷，第155页。

史的发展来讲，就不好全盘否定唯心主义了。几乎是在我的文章发表的同时，有些老先生也发表了讨论哲学范畴的文章，比如张岱年在《人民日报》发的文章。”^①先生提到的，是我发表在1980年《读书》第1、2、3期的论文，题为《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起进步作用》《对唯心主义要具体分析》《作为哲学思想发展前进的一个环节的唯心主义》，系出席1979年太原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学术会的论文，《读书》分成三期连载。1980年10月，在黄山召开了讨论唯心主义的专门学术会议，我又写了《论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对辩证法的促进作用》一文，对流行的教条说法“唯心主义必然对辩证法起束缚与窒息作用”进行批判，这是前一篇文章的补充和深入，从人类认识发展本身，为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的积极、正面作用提供了较深入的论证。^②汤先生所讲范畴的讨论，对促进中国哲学史的健康发展影响更大。为推动讨论的深入，在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召开了“中国哲学范畴学术研讨会”。这些是在哲学探讨上开风气的事，都是“自由即创造力”的见证。它迅即改变了中国哲学史由教条主义所造成的“死板”“僵化”“人云亦云”“万马齐喑”的局面，开始了哲学史研究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夏榆访问先生，先生说：“哲学家从事哲学工作要有条件，首先你要能够自由思想，自由创造。不能自由思想，不能自由创造，哲学就变成了死的哲学。自由是一种创造力，没有了自由，你的创造力就没有了。”这把重点集中到哲学工作者个人，即“自由”不是外在的，是内在的。“文化大革命”时

^① 《汤一介：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马国川访问），《汤一介集》第10卷，第202—203页。

^② 金春峰：《论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对辩证法的促进作用》，载于《求索》1981年第2期。

期，暴力横行，哲学家不可能有思想自由。但改革开放时代，能否“自由思想”，主要因素则是思想者个人。事情也确是如此。这时期，思想、文学、艺术、音乐、美术等方面涌现了许多创造了历史的人——“弄潮儿”，他们都是自己为自己创造“自由”的。因为如此，他们能高瞻远瞩，驾驭潮头，以其创造力突破种种框框，为时代开辟新路，谱出新篇。如果只求平安度日，当然就不可能有创造力涌现而只能被时代抛弃了。^① 过去如此，今天依然。

在《有话要说——序跋和致辞·世纪之交谈精神与信仰》一文中，先生说：“如果80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还感到中国社会存在着‘精神危机’‘信仰危机’，那么9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也许较安于现状了。特别使我担心的是，在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追求金钱，二是追求权力。这种情况在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中也有相当的影响。北大有些人对清华很羡慕，因为清华仕途比较好。不能不说中国现在确实存在着‘精神危机’。”先生指出，“90年代，学术界表面上很活跃，介绍和发挥过不少新思潮……但是所有这些思想流派对社会都无什么大影响。可是各种气功学说却在社会上大大地流行了。‘法轮功’事件震动朝野，一时间报刊、电台、电视天天批‘法轮功’；好不热闹。我对此一直很想不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信这样一奇怪的‘法轮大法’？也许只有一个回答就是，我国上上下下几乎都失去了‘理性’，都没‘精神支柱’了。这不能不说，我们这民族存在着深刻的全民族的‘精神危机’。”^② 要救治这种“精神危机”，先生指出，“以下几个方面也许是我们应该考虑的。

^① 《汤一介：给中华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夏榆访问），《汤一介集》第10卷，第130页。

^② 汤一介：《有话要说——序跋和致辞·世纪之交谈精神与信仰》，《汤一介集》第8卷，第237页。

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曾经发生过要求把人们的思想信仰统一于某种特定的思想信仰下，或者要所有的思想信仰都必须在某种特定的思想信仰指导下才可以被允许。这种状况是极不合理的，也是行不通的，甚至会扼杀一个民族的生命力。”“一个合理的、健康的社会往往至少要由两套社会机制来维系，一套是较为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如民主政治等），另一套是社会的道德准则（它往往与宗教信仰或伦理体系分不开）。前者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但它主要应是保护人民的各种权利和要求人民尽一定的义务。而后者则往往和人们的个人信仰有关。对后者，只要是有益于人类社会生活，就不应用政治权力去干涉，它对政治来说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从历史上看，用政治权力打击宗教往往适得其反。”^① 先生指出的两套体系实际是相互联系的。第一套体系实更为重要。唯有这两套体系健全了，社会发展才能走上正轨，个人自由和创造力才能旺盛成长。两套体系的完善都是我们今天应该为之继续努力的。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

1983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了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先生在会上提出，中国哲学的主题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是对真善美之人生境界的追求。这一新提法不仅告别了从教条主义和西方哲学而来的对中国哲学的剪裁、切割；也为中国哲学研究开辟了一新的方向。由此一个有真正中国特色的哲学人学挺立起来。会上，先生还提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融合”这一极为重要的时代

^① 汤一介：《有话要说——序跋和致辞·世纪之交谈精神与信仰》，《汤一介集》第8卷，第243页。本文作于1999年11月27日，原刊于《跨文化对话》第4辑，2000年5月。

课题，引起与会学者极大的关注与震惊。因为这在当时不仅是超前的，也是极富创造性和敢冒风险的。今天，在自发与实践的层面上，儒学已不再是一种学术，一种历史，一种供分析研究的对象，而重新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生活运动，成了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有的地方甚至以之为培训党政干部的教材、教育基地。先生三十多年前的“惊雷”变成了现实。

但“实践”还是无序的、混乱的，迫切需要理论的自觉与建构。理论上，哲学层次上，“融合”是指矛盾的两个对立面重新统一后形成了新的“发展形态”。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融合”也当如此。“融合”与“会通”不同。先生有篇文章讲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会通”，指出两者有一些相类似的性格；但两者仍是各自独立的“存在”。“融合”则是两者“融合为一”。就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而言，这是否真的可能？将如何实现？实现后将成功何种新的学术理论形态？这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在答记者康香阁的访问中，先生提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故有文化就和唐朝的佛教禅宗一样，这里有源和流的问题，就是说文化有个源和流的问题。那么，中国文化从夏商周三代起是个源头，流传下来。它在流动的过程中，其他文化不断地加入，比如佛教的加入，其实，在唐朝基督教（景教）也进来了，但没有得到发展，到明朝基督教又进来，就是利玛窦他们进来了。当然，近百年来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影响非常大。长期来看，中国文化自身是个源，其他文化的加入都是个流，它是源和流的关系。那么，中国自身的文化有个源头，马克思主义是汇入，就和印度的佛教进来一样。这个问题做好了，就可以树立起我们文化的主体性，就是说我们的文

化是以我们中国的文化为主体，而不是以外来文化为主体。”^① 认为“融合”是以中国儒家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一文中，先生又指出，“影响着我国社会的可以说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几千年来的‘国学’，即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文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思想文化，我们可以称之为‘老传统’；另一个是影响中国、改变着中国社会面貌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称之为‘新传统’。我们必须‘传承’这两个传统，并且要逐步使两个传统在结合中‘创新’，使之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顺利发展，适应当前世界已经形成的‘全球化’势态的需要。”^② 先生指出，“任何社会文化的建设都不可能离开它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历史上长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生长、发育的儒学，曾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子，我们作为中华民族后代子孙不能也不应该人为地把这个根子斩断。如果把有两千年历史的儒学抛弃掉，无疑是宣告我们这个民族曾赖以生存的民族精神不复存在，或者说作为一个独立的有自身生命力的中华民族不复存在，而成为其他国家的附庸或殖民地。还特别要说明的是儒学中包含着某些社会主义思想的因素，它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有着无可代替的价值（这个问题我将会在后面讨论到）。因此，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发展其有益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宝贵思想资源，创造新时代的新儒学。”^③ 认为“新儒学”是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后出现的。这为“新儒学”的建立指出了方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当今出现的种种自己命名的“新儒学”，似乎没有一家是自认如此、自觉应该如此的。

① 《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访谈录》（康香阁访问），《汤一介集》第10卷，第269页。

② 汤一介：《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汤一介集》第6卷，第278页。

③ 同上书，第279页。

另一方面，先生指出，“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进入大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这样的现实，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要‘传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百年来为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得到重大发展？一方面，不能离开中国社会的现实要求；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与中国传统文化接轨，特别是与儒学有机结合。”^① 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对儒学的“融合”。陈新夏先生《论当代中国哲学格局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文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甚至思维方式已经较为中国化，但其话语表达和概念体系却尚无鲜明的中国特色，盖因其尚未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哲学的思想资源。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哲学中蕴含着大量优秀的精神价值资源，它们是中国人的文化身份进而民族身份和社会身份的认同的根据，使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精神境界和精神享受迥异于其他民族，使中国人的认识、体验和追求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鉴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照中国时代和实践的使命，鉴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有效地解答中国的问题、融入中国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全方位地成为地道的‘中国的’哲学，体现中国的特色和优势，为此，不仅要一如既往地关注中国的时代、实践和生活，还要更加自觉地吸取哲学和中国文化的思想资源。”^② 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融合”儒学以发展自身的一种自觉；但应吸收中国文传统文化的一些什么资源？吸收了会如何改变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学术、思想形态？文章

① 汤一介：《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汤一介集》第6卷，第280页。

② 陈新夏：《论当代中国哲学格局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载于《新华文摘》，2014年第16期，摘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3期。

并未提出。希望马克思主义学者继续深入探讨，解决好这一问题。

早在1986年，先生就指出：“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景如何？我们可以说，它必定是一种现代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这种现代化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可有两种提法：一种是发展出一个适合现代化要求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另一种是发展出一个适合现代化要求，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这两种前景也许是一回事，也许不是，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不过我相信它们是一回事。因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首先是中国的，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它不仅需要吸收当代科学的新成果，研究当代哲学的新问题，回答中国和世界所遇到的新问题，而且也需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起积极作用的方面。这样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对人类文明做出特殊的贡献。……如果马克思主义能够中国化当然有利于我们的社会发展，有利于我们的现代化的实现。至于第二种提法也许只是角度不一样，结果则可能一样。……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一样的……我们必须为之而努力奋斗。”^①

从1986年到现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它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主义旧形态，重新确立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形式，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亦使儒学获得了新的地位和活力。由于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马克思主义作为最高的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思想本质鲜明地呈现出来，儒学作为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的基本性质亦呈现出来，从而为两者的“融合”提供了基础，扫清了障碍。故先生所期盼的两者在思想上的“融合”，一定会成为现实。

事实上，我国建设“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论述，

^① 汤一介：《“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的结合》，《汤一介集》第7卷，第19—20页。